

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

王东杰¹

【提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川在全国舆论中处在较为边缘的位置，被时人视为国中之“异乡”。外省人士对四川了解不多，已有的认知也多为负面的。这一形象既与四川混乱的政局及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有关，也包含了想像的成分。旅居外省的四川人一方面致力于改善四川的政治、社会面貌，另一方面又努力消除外省人对四川的负面印象。本文考察“国中异乡”现象形成的原因及旅外川人围绕此问题发表的言论，希望在重构这方面社会心态的基础上，从“地方史”的角度探索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统一”问题。

【关键词】民国 四川 地方与全国 旅外川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实现国家统一。对此，学界已经做了一些研究^①。但仍有不少值得继续注意的问题。盖“国家统一”要从“全国”和“地方”两个层面加以了解，方为全面。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全国”的大范围着眼，当时人们是如何从“地方”的角度对这一过程做出反应的，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这部分是由于近代区域史和地方史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造成的。以四川省为例，现有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范畴，社会心态史基本上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我们无法确切感知时人对地方（四川）与全国的关系是如何理解的。然而，缺乏了对地方社会心态的认知，所谓“国家统一”也就往往被视为仅仅是一个政治权力（辅之以军事权谋）的运作过程，这一印象至少是不全面的。^②

本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集中在20年代中期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这一时段）旅居外省的四川人对全国与四川关系

¹ 作者：王东杰，1971年生，讲师，在职博士生。四川大学历史系 610064

* 本文承罗志田教授批评指正，谨此致谢。

① 相关研究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考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章《构筑“中华民族国家”》；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的一系列文章；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收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89—431页）；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石岛纪之《国民党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收入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88—297页）。

② 目前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的研究，多集中在“军阀史”的领域。1987年以前国内研究和资料出版概况，见孙代兴《西南军阀史研究述评》（收入《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7—47页）。1990年代以后主要有匡珊吉、杨光彦主编的《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美国学者Robert A. Kapp的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 1911—193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3) 有中译本，题为《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因笔者没有找到，故本文仍征引英文版原书。抗战期间的有关情况，可参考《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本书编委会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刘君的《简论西康建省》（收入《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21—331页）亦涉及相关问题。

的认知为研究对象，希望在重构此一方面社会心态的基础上，略微增进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①。需要申明的是，由于材料的限制，本文所探讨的主要也是旅外川人（及部分有过旅外经历的在川人士）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当时全体四川人的意见。这些旅外川人的身份多系青年学生，也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商人及部分政界人士。旅居地以北京、南京、上海为主。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将讨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川在全国舆论中作为国中之“异乡”的边缘形象，重点探究这一认知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讨论旅外川人对四川局势的评论与提出的对策；第三部分讨论旅外川人为消除外省人对四川的负面印象所做的努力。

国中的“异乡”

1930 年，旅沪川籍青年学生王宜昌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有一个‘异乡’在现在底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僻处西南底四川。”“外省人士，不有认为四川是文化落后，野蛮混乱的么？外省人士，不有认为四川是崎岖阻险，神秘难知的么？”王宣称，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误解”与“难知”，“使人们都明白四川是怎样的不异的‘异乡’，使人们明白四川底现状与历史发展，使人们明白四川和外省要如何共同发展她们底将来。”②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初年，一位署名“山河子弟”的四川留日学生就已经注意到四川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不同：“四川之风土、四川之气候、四川之历史、四川之社会、四川之文学、四川之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另辟一新天地”，甚至可说“负有一独立国的资格”③。

四川与国内其他地方比起来，到底是“异”还是“不异”，这两位作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在山河子弟的表述中，四川不但“异”，而且“异”得厉害；而王宜昌的目标恰恰是希望消除这一“异”的认知，而把言说重点落在“同”的一面。

四川在近代中国是不是个“异乡”，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如我们所见，王宜昌和山河子弟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论证策略对这一问题做出的是不同的回答。四川社会和其他省份比起来，确实有同有异。关键在于，在不少外省人的认知中，四川的确是一个“异乡”。这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四川与外省多有隔绝，因此，基本上处在外省舆论关注的范围之外；其次，全国主流舆论界对四川的有限认知也以负面为主。本文想要讨论的是，四川是怎样成为国中“异乡”的，旅外川人对这一认知又是如何反应的。

四川地处西南，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四面环山，铁路未修，交通不便。与西南以外地区的联系，水路主要经三峡，陆路主要经剑门关，这两处又多险峻。因此，地理因素是四川与外隔绝，成为（或被认为）“异乡”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时人的共同认知，“僻处西南”以及从李白以后就被人广泛接受的“蜀道难”之类的话，乃是当时人们谈到四川时必用的“流行语”。

交通不便导致了信息相对落后，这在近代整个中国趋新的大形势下，尤其引人注意。1918 年，吴芳吉在写给川中朋友的信里说：“蜀中古籍易求，新书难得，而杂志报章尤少。”④ 这一状况到了 20 年代中期仍未有大的变化。1925 年底，舒新城应邀入蜀，一路上“最感不快的”，“就是在新闻纸上得不着新闻”。“因为邮递与排印的种种迟缓”，川东地区“消息最灵通的”《新蜀报》的消息竟比上海的报纸晚了十几天。他因此感慨：“我记得某君作《四川游记》说四川人民对于中国的大事，

①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的一系列“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著作，多涉及各省旅外人士对本省“现代化”运动的推动作用，但是大都没有把旅外人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加以考察，因此有可能掩盖了旅外人士言行的特殊性及其与在省人士的区别。兰州大学王劲、杨红伟对近代甘肃“留学生”（主要是国内留学生）对地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做了研究，参见《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载《兰州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 期）。

② 王宜昌：《关于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 1 期（1930 年），第 1 页。

③ 山河子弟：《说鹃声》，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 年，第 564 页。

④ 《与李宗武》，《吴芳吉集》，巴蜀书社，1994 年，第 635 页。

只有历史知识，决不会受新闻的影响；当时我很觉得这话有点过于唐突，现在身历其境，又觉它不是全无道理。”^①

省会成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堂堂国立（成都）高师”的图书馆“无论在普通的报纸杂志方面或专门的教育书籍方面，似乎比我家所备的还有限……图书馆内亦有若干定期刊物，但除了省外各校赠阅者外，都是本省的东西，而关于全国及世界的各种新闻则又无不从京沪报纸中转载而来。故在此地欲求从新闻纸中了解天下大事，其难至少也与上青天的蜀道相等。”新书店也很少，除了商务、中华有自己的服务部外，新_____出版物最知名的经销商要算是“华阳书报流通处”了，但这家店铺面不大，“每年的营业有时还够不到糊口”，可知并不算太受欢迎^②。

由于报纸杂志少，新闻又不“新”，20年代的四川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偏于“古”而疏于“今”。换言之，这一时期大多数四川人心目中的中国与京、沪、宁等东部大城市人们所体会到的中国存在着或长或短的“时间差”。当然，这不是说四川人不趋新。事实上，近代（尤其在20年代中期以后）四川（主要是成都、重庆）普通的社会心态大抵趋向于“新”的一边。不过，像四川这样的内地，通常在趋新的大势下扮演着“跟风”的角色。四川人认为新的，在“中心”地带看，其实未必就那么新。例如，吴芳吉在1927年任教成都大学，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成都大学“教师分新旧两派，若吉则最新之人也”^③。他在成大是否算得上“最新”，容或有不同看法。但吴本人和收信人（刘弘度夫妇）在当时的中国，虽然还谈不上旧派，但远非“最新”则可以肯定。

新闻不“新”的情形在30年代中期有了一些改进。“和文化宣传最有关系的报纸，在成都也有十多种”，“比较灵通”的报馆“都置有收音机一部，把每天南京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的新闻报告来照登”。不过，成都仍然找不到“几处稍微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于是一般人在思想上只有落伍”。但“这并不怨一般人不努力，实在是因为环境上缺乏求知识的便利”^④。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显然是造成国中“异乡”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政治方面看，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义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间，国民党基本上在四川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四川政权落入新兴军人的手中。比起更具全国性质的国民党人，四川新兴军人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据傅渊希的统计，1913—1933年间四川共发生30次战争，其中“有民主革命战争四次，即‘癸丑’、‘护国’、‘护法’、‘援陕’之役，其余二十六次都是军阀混战”^⑤。从时间上看，这四次颇具声势的“民主革命战争”集中在1913—1918年，基本上是由老一辈领导的。自新兴军人占据权力中心，四川战争乃真正成为“内战”，也就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1925年，就已有人批评四川军人“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护国护法，还算借题发挥，能掩众人耳目。西南政策，究竟为作何事，实是无理取闹。”^⑥同年，江安人士发布宣言，亦云：“惨我蜀自首起民兵，以覆清室，在人民之本意，本欲自立民国，以大洗永为奴隶之羞，乃大权误落军人。军人又不学，日以内讧为无名义之丑战。”^⑦

曾和冯玉祥、刘湘等有过来往的高兴亚说，四川新兴军人“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⑧。窃以为“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刘文辉曾称，20年

① 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9年第2版，第53页。

② 舒新城：《蜀游心影》，第127、147页。舒文是1926年春所作。1927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中国新兴文艺”终于“迟迟地”“输入了四川这荒凉的园地”。（李嘉：《四川新文艺运动》，《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第31页）一篇署名“默情”的文章也说：四川“有组织的负文化使命的”新书店只有一家“华阳书报流通处”，颇使一般欲求新知的青年感到不满足。（默情：《四川文化的一般》，《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第23页）新书店是否只有这一家，另当别论。不过，新青年对成都的文化环境不满足，却得其实。但若把默情文与舒新城文作一比观就可发现，这批新青年在20年代中期的成都其实并不居多数。

③ 《与刘弘度刘柏荣》，《吴芳吉集》，第928页。

④ 征言：《成都生活的形色》，《新生周刊》第1卷第14期（1934年5月12日），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⑤ 傅渊希：《四川内战年表（1913—1933）》，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⑥ 凤兮：《对于此次川战之感想和希望》，《蜀评月刊》第7期（1925年6月），“言论自由”栏第12页。

⑦ 《江安全县人民对于时局之宣言》，《蜀评月刊》第7期，“来电”栏第6页。

⑧ 《冯玉祥和刘湘的秘密往来》，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蓉参史料》第2集，第42页。

代末 30 年代初，他自以为已经能够收拾四川的其他军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很快败退^①。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以自保为主。

与此同时，四川军人的自信力也在下降。不但无向外发展的“野心”，连统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为助。据高兴亚说，当时，“在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军阀处，甚至没有一个通都大邑没有四川军阀的代表”^②。但是，四川军人向外寻求援助的努力并不成功。1928 年，戴季陶说：“各军所谓代表先生，汉、宁、沪、粤、豫、晋、平各地，无处不有，十人八人，各为其主，逢人说项，互相诋毁，川军劣迹由是尽情暴露，一切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信用，完全扫地”^③。四川多头并立，不能统一，颇为外省军人看不起。因此，他们很少与川军结盟。结交外援成了一厢情愿，结果只能用内斗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这也使得四川军人在实际上失去了积极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机缘。

傅藻琛曾经说，四川人“素来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外边的人也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管四川的事”^④。20 年代的四川在全国政治地图上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对“外边”的影响远还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因此，也就常常处在忙于逐鹿中原的外省军人和“中央政府”的关注视野之外。从实际看，南北政府对待四川军人多采取承认现状的态度，分别委以官衔，借以羁縻。这些“官衔”又往往成为四川军人内战的凭资。

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Robert A .Kapp)注意到，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军人，当时人们关于四川新兴军人的记录和叙述都是极少的。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期，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出版的全国性报刊上有关四川情形的报道十分简略。国民政府时期出版的各种报告、年鉴、统计材料等关于四川的信息也多有缺失^⑤。官方统计数据的征集和保存乃是中央政府行使其行政权的重要的象征性体现^⑥。四川在全国统计资料中数据的缺失，既是其内部分裂的表现，更表现出它与全国行政系统的疏离。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谈到，现代出版事业对信息的沟通，打破了地理隔阂，诱导人们“想像”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并认同于这一共同体^⑦。当然，对共同体的想像完全可以靠历史追溯来完成，但现代传媒不断强化这一想像的认同，成为塑造人们民族认同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四川出现在全国性媒体上的几率不高，显然加重了外省人对它的淡漠。而媒体上关于四川的报导少，显然不是因为战争频频造成采访不易。盖国内其他一些地区虽然也是战火纷飞，但却频频“出镜”。事实上，现代传媒对新闻的报道，常常要受到读者阅读喜好的影响。因此，四川出现在报刊上的几率少，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外界对四川缺乏了解的兴致所致。

这些不多的报道又往往集中在四川的混乱方面。胡光回忆说：“因为多年川局扰攘不宁，外间的人们简直不明究竟，甚至连川籍的吴鼎昌和胡政之几位先生在天津所办的大公报，还把四川冠上了‘魔窟’的绰号，使得‘下江’的工商界人士闻而裹足，都不愿到四川去。”^⑧“不明究竟”，又不敢身历其境，印象实际上也是想像。1931 年，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李振吾应邀访问四川，回到浙江以后发表演说，感想便有些不同：“外省人士，对于四川状况，多以新闻消息为根据，其隔膜情形，与外国人士视吾国相同。其实川省现状，并不如吾人意想中之混乱”^⑨。四川当然混乱，但“新闻消息”的“导向性”也显然对外省人关于四川的负面“意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①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3—4 页。

② 《冯玉祥和刘湘的秘密往来》，《蓉参史料》第 2 集，第 42 页。

③ 戴季陶：《忠告川军将领》，《新四川》创刊号(1928 年 9 月 1 日)，第 3 页。

④ 傅藻琛：《四川的病根究竟在哪里?》，《蜀铎》(北平师大四川同学会主办) 第 2 卷第 2 期(1936 年 7 月 31 日)，第 1 页。

⑤ Kapp , op .cit ., pp. 25, 28 , 71 .

⑥ 关于官方的统计数据可参考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 年) 第 220—221 页。

⑦ Benedict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hetford Press, 1983, pp.39 , 47 .

⑧ 胡光：《波逐六十年》，(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 年，第 274 页。

⑨ 李振吾述、陈慧一记《川游见闻》，《生活周刊》第 6 卷第 11 期(1931 年 3 月 7 日)，人民出版社，1980 年影印本。

当时省外报刊上关于四川的各种记载也颇多传闻，因此不免彼此抵牾。1930年，《生活周刊》上有篇文章说：四川军人盘剥极重，“军人们把这些钱除了孝敬姨太太买枪支而外，大都存入海上外国银行。听说除了不要利息不算，还须出百分之四的保管费”^①。此处虽然明言是“听说”，但是把钱存入银行，不要利息，还要倒贴，无论如何都太不近情理。半年以后，该刊又发表一位署名“士初”、题为《四川真相》的文章，对此则另有一种说法：“四川省外之各军阀，剥削金钱，每存储于外国银行；四川则无外国银行，军阀所抢夺之金钱，每苦无地储存，则只有收买田地房屋。”^②事实上，不论对读者还是作者，四川“军阀”怎样处理他们“抢夺”来的金钱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描述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早已存在的败坏形象相一致。

士初的具体身份不详，不过有意思的是，他的文章主要针对的竟然是为四川做了一点辩护的李振吾。他认为李文“诸多失实”，“使我等川人见之而生忿”。失实主要有二，一是称赞杨森在万县惨案中“抵御英舰炮击”；二是谓四川“民力雄厚”。尤其是后者，士初认为李振吾忽视川民疾苦，有受军阀“优待”的嫌疑。其实李说得很清楚，四川不是不乱，只是没有外边人们“意想”的那么混乱而已。可是，这一点回护之词却使身为川人的士初见而“生忿”。原因恐怕在于作为四川人，他对四川“军阀”的“剥削”有更深刻的体验，故而更难容忍有“取媚军阀”之嫌的字眼。士初其实是把四川的民众和四川军人分作两类，但他不太了解的是，在外省人的认知中，这一区分并不太鲜明，往往笼统地归结为“四川”二字。因此，他也很难准确地理解李振吾的真实意思。

不过，在另一方面，双方倒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外省人不了解四川，四川在中国如同“外国”：“军阀林立……兵匪如毛，蜀道艰难，外省人闻而生畏，不得履其地知其详，有加以秘密国之称者。省外人视四川，几如外国人之视中国，且或更有甚焉。盖外国人虽不知中国，然常派人来华调查……省外人不知四川情形，鲜有闻入四川作切实调查者，省外人之知四川，全凭报纸所载之一二简短通信而已。”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邹虽然同样不了解四川的实情，但面对两种看来不同的意见（其实未必不同），他在“编者按”中却表同情于士初。他作此判断的依据，除了士初是四川人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士初的说法更符合邹心中已经存在的印象，正所谓“先入为主”。

在这一事例中，关于四川是否是“异乡”，正好像王宜昌和山河子弟一样，士初和李振吾的意见也是有同有异。同的地方在于肯定四川在外省人心中的边缘地位，异的地方在于如何估计四川混乱的程度。就此而言，在四川人“士初”眼里，四川之“异”的程度要超过外省人李振吾。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四川的“异乡”形象也不仅仅是外省人单方面想像的结果，像士初这样对四川不满的四川人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这既然是一个程度问题，就和每个人心中所持的不同标准有关。整体而言，四川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仍是负面居多。

这些负面形象同样与四川在地理上的“封闭”分不开。1927年，刘伯承等发动顺泸起义，在通电中说：“四川僻处西陲，思想落后，反动分子，较为嚣张。内讧连年，糜烂甲于全国；敲骨吸髓，剥削不遗耕氓。”^③这一描述很能代表当时国内一般舆论中的四川形象和这一形象背后的认知逻辑：由于四川地理（主要是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位置偏僻，故四川人不开化，“思想落后”；而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又使得四川远离革命中心，故政治腐败，“反动分子”也“较为嚣张”。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本已存在的地区差异，在近代趋新大潮的推动下，由于地理和交通的便与不便，得到了强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川成为国中“异乡”，也正是这几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一“异乡”在实际上“异”到多大程度，一般省外人士却难以做出明确的判定。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夔门内外的实际情况都有了解，才能做出比较和评判。如李振吾和王宜昌都感受到的，“四川的现状”也不一定像它在人们“意想”中那么“异”，换言之，四川乃是一处“不异的异乡”。当然，对四川的“异”与“不异”都体会最深并且最在乎的，还是身在外省的四川人。

① 粱非：《罩在雾里的四川》，《生活周刊》第5卷第49期（1930年11月16日）。

② 此处与下段均见士初《四川真相》，《生活周刊》第6卷第15期（1931年4月4日）。邹韬奋的“编者按”见该文后。

③ 《新蜀报》1927年1月19日；又见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第226页。

旅外川人言论中的四川

如傅葆琛所说，四川人通常“不去管外边的闲事”，另一方面，四川报刊事业不够发达，川内人士即使有意见也很难找到公开发表的园地。因此，旅外川人成为我们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人对四川和国内局势看法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多对四川状况不满，又颇受川外思潮的鼓荡，对夔门内外的情形都有了解，有改变四川局面的志愿，但又身不在其位，故一般通过文字抒发。

青年学生在旅外川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一位成都大学旅沪学生在1930年谈道：“四川的青年，尤以高等自觉了的青年，都觉得四川受了地理的限制，交通的阻厄，不能满意地接受中外的新的文化和思潮……还有许多人都认定四川的文化太落伍，在那里得不着什么，想要从根本改造，遂相率出川在中国文化中心之上海北平去得到地货[道?]的中西文化”^①。作者本人就是这群“高等自觉了的青年”之一，这段描述可谓现身说法，颇得其实。事实上，让子女去外省求学也是不少家长的心愿。据熊丸的回忆，当时四川“只要家里有点钱，或还算过得去的人家”，都把子女送到南京、上海或北京去读书^②。黄稚荃也说，1930年，她的父亲黄沐衡对她说，四川军阀割据，无异土寇，在四川无前途，遂劝她去日本留学^③。

旅外川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学成或者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胡先在1933年观察到，四川很缺乏专门技术人才，但是，“以政局紊乱之故，少数确有专门学问之人才，类皆不愿牛骥同皂，宁在外省服务”^④。比如，任鸿隽就曾想在四川发展实业，但终于发现“四川这个扰乱的样子”，“非四五年之后是没有什么事可办的”，遂决定去北京^⑤。

第三部分人是一批四川籍国民党元老，如熊克武、杨沧白、朱之洪等。不过他们大都已经退居政治舞台的边缘，平时对时事少有评论。在国民党内比较主流一点的，如戴季陶和张群，也不太发表主张。且戴氏本人并不认同于四川省籍。这一时期川籍国民党人喜欢发表有关四川言论的，多是非主流派的年轻人，他们既对四川状况多有批评，也不赞同国民党的四川政策（尤其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

最后是在外特别是上海的商人。他们即使从做生意的角度考虑，也要对四川的局势，尤其是四川统一问题多加关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组织了不少以改进四川政治与社会局面为宗旨的同乡团体^⑥。如吴虞在1922年任教北大期间，就曾和王兆荣等人筹备组织过川政改进协会^⑦。1924年由旅沪川人组成的蜀评社的宗旨是：“挽救蜀民艰苦，振兴全蜀百业，促进社会文化，增加蜀人幸福”^⑧。1925年，旅沪川人组织了以废督裁兵为己任的蜀新社^⑨。这些团体对川事多所建言。以1925年的“倒杨之战”为例，仅上海一地就有四川旅沪同乡会、旅沪蜀商协进会、南洋四川侨商旅沪商业协进会、上海蜀评社等团体发通电，要求息战^⑩。这些团体之间常常互相声援。如1925年，隆昌县京津留学会以防区当局明令种植鸦片，人民饱受苛政之害，通电全国，蜀评社马上予以支持，致电四川当局，请禁鸦片^⑪。

他们还办了不少刊物，以发表对川事的主张。据笔者所见，除了蜀评社的《蜀评月刊》外，还有1928年出版的《新四川》（国

① 默情：《四川文化的一般》，《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第23页。

② 《熊丸先生访问纪录》，陈三井访问，李郁青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第12页。

③ 黄稚荃：《罔极之恩》，收氏著《杜邻存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

④ 胡先：《蜀游杂感》，《胡先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348页。

⑤ 任鸿隽致胡适，1922年8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第160页。

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省旅京、津、沪的同乡团体也经常利用大众传媒，以发通电的方式，“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互通声气，对省内的政局变化或行政措施发表意见与形成压力”，与本文所谈到的情形有相似处。可以参阅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02—204、590页。

⑦ 《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⑧ 《蜀评月刊》第1期(1924年12月)，第62页。

⑨ 《蜀新社宣言》，《蜀评月刊》第3期(1925年2月)，“来件”栏第59—60页。

⑩ 《蜀评月刊》第6期(1925年5月)，“函电”第2页。

⑪ 隆昌京津留学会通电和蜀评社通电均见《蜀评月刊》第2期(1925年1月)，第53页。

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主办)、1928 年在上海出版的《蜀道周刊》、1932 年在南京出版的《川事评论》、1933 年在上海创刊的《蜀青》等。此外，民国大学(北平)、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浙江大学农学院、大夏大学(上海)等高校的四川同乡会与同学会都出版过他们自己的刊物。如前所述，旅外川人兼具川内外两种知识，因此，他们对川事的主张，也多有全国与川内两方面的考虑，既有和国内一般舆论界相同的一面，又多有特殊性。比如，20 年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一个主流就是向往统一^①。不过，对这一时期的四川人来说，“统一”二字在全国统一之外，别有一层更直接的含义，那就是先求统一全川。

20 年代，随着国民党的势力退出四川，北洋内部也因分裂而政争不已，自顾不暇。四川的新兴军人则历经多次混战之后，羽翼已成，也不愿再受制于人。但是由于群雄并起，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以为仲裁和协调，各军之间的内战也愈演愈烈。吴晋航等指出：1918 年以前，川军增加数量不大；自 1918 年到 1920 年，由于防区制的推行，数量“成倍增长”。但是，“1920 年扩编的川军，还是经过各军共同点编而成的，其编制和番号还是统一的。在这以后，直到 1932 年二刘之战结束，川省几乎无岁不有内战，而每经一次战役，即有一次扩军，其扩军的方法亦与前不同，即番号与编制均由各个军阀自行决定，漫无限制”^②。

打来打去并没有打出统一局面，相反，胡先注意到，四川的多数军人其实并不太想统一，“中下级军官最喜内战，盖内战一开，则升官发财之机会至，而战争之威胁并不大，不足顾虑也。在曾为军阀巨头者，并不欲轻有内战，能统一全川固佳，否则但求保持其固有之防地，亦足以窃号自娱。至于师旅长，则为达其领袖欲，有待时而动之意。在团营长，则子女玉帛之意尚未满足，尤喜趁内战以肆其混水捞鱼之伎俩矣。此种心理不能铲除，则四川军阀之祸，永不能灭”，“统一之局面”，也“殊不可乐观”^③。任鸿隽也有类似的观察：“在四川的军阀，无有一个不欢迎内战的，尤其是所谓二层将领们。因为一经战事，他们便可以身价十倍，待价而沽。”因此，“四川的内战比任何地方来得特别多”，每战一次“军队便有相当的增加”^④。盖几大军阀实力相差不大。不打，不能得中下级军官之心；打得太激烈了，就不能自保。故使战争频繁而“威胁并不大”。

实际上，由于防区制的推行，四川军、政、财、教各权都不能统一，一省之内也俨然异国。因此，打破防区制，就成为四川统一的关键所在。如 1924 年底《蜀评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今者举国上下，正谋彻底改革。武力迷梦，终归失败，既已昭示其例，吾川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者，即在废除此防区制度。”^⑤

那么，如何求得统一呢？有人主张由中央政府解决四川问题。1924 年段祺瑞上台后，一度予人“渐入太平之境”的希望。因此，便有人呼吁：“惟我川民，受痛最深，苏尤切！想中央断不致漠然视之，必有以解其倒悬，慰其痛苦”^⑥。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厢情愿：“方今枢府”其实根本就“目不及川”^⑦。第二年，蜀中旱灾发生，《蜀评月刊》社致电北洋政府，请划拨交通附捐洋 2 万元，拨还川路应还股款 50 万，以赈蜀灾。不久，该刊发表了一篇署名“川汉铁路第四届股东大会潼南县代表”奚湘焘的来稿，云：“中央哪还记得起我们四川的小百姓啊。查上年办赈之初，邓锡侯曾先电中央拨还路款办赈，中央竟硬起心肠，置之不理。这回贵处俭电主张，还有希望么？”他哀叹道：“未必执政者堂高帘远，莫得眼睛看我们四川的人吗？”^⑧同年夏，驱杨之战爆发，该刊发表评论说：杨森和反杨派所持理由都很堂皇，“可是自我们观之，两方面都属无意识的举动，绝没有充分的理由。北京临时执政府所下的乱命，更不必说了。只有老百姓遭殃”^⑨。

①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等文，均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一书。

② 吴晋航、邓汉祥、何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第 30—31 页。

③ 胡先：《蜀游杂感》，《胡先文存》上卷，第 339 页。

④ 叔永：《四川军阀的末路》，《独立评论》第 75 号（1933 年 11 月 5 日），第 3 页。

⑤ 澄心：《地方治安与军队驻防》，《蜀评月刊》第 1 期，第 7 页。

⑥ 《卷头语》，《蜀评月刊》第 2 期（1925 年 1 月），第 2 页。

⑦ 胡吉庐：《希望吾川人士大家来为康藏现世的研究》，《西康疆域溯古录》附录，商务印书馆，1928 年，第 321 页。

⑧ 奚湘焘：《收回路款办赈之痛言》，《蜀评月刊》第 9 期（1925 年 8 月），“言论自由”栏第 8—9 页。

⑨ 杰乎：《吾人对于此次川战应有之觉悟》，《蜀评月刊》第 7 期（1925 年 6 月），“言论自由”栏第 1 页。括号内文字系本文作者所加。

依靠中央政府之路既已不通，解决四川问题还是要靠四川人自己。如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四川也多有召开“国民会议”、“善后会议”的要求。如“和平弭兵会所主张的‘善后会议’，十三县联团副处长胡南先等主张的‘川民代表会议’，国是讨论会所主张的‘川民会议’，张表方（澜）所主张的由川康督办召集‘军民会议’，蒲伯英（殿俊）所主张的‘团绅会议’”等。不过，这些主张虽多以“民”为号召，实际上人们也很清楚，解决四川问题的关键还是军人：“多数省民所抱的观念，可分两派。有一派的人们是希望各军阀能听从省民的劝告，停息战争，大家捐弃前嫌，通力合作，分主川政。又有一派的人们是鉴于迭次呼吁和平的失败，希望由某方实力派，索性作一度之彻底战争，把其他之势力削平，统一全川”。“这两种希望，在川人心中，极为普遍，尤以第一派的势力较为雄厚。”⁸ ①

这两种方案反映了人们对川军各派实力的不同估计。第一种“分主川政”方案的支持率较高，表明大多数人对靠战争打出统一局面的计划缺乏信心。这是鉴于年年混战却不能统一的经验所做的判断。因此，他们更希望能够在维持现有防区制下的势力均衡的状态下实现和平。这是谋求“合作”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却被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实现的方案。旅外川人中也有寄希望于四川军人吸取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教训放弃武力者：“此次全国大乱，以曹、吴数年蓄养之精锐，合十四省之全力，不三月而土崩瓦解，卒至团城幽囚，鸡犬隐遁。武力迷梦，已与各军阀示一先例。想拥兵自雄者，不难有几分之觉悟。”②但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倒杨之役正在酝酿中。

在弭兵运动中，不断有人建议四川军人向基本不大参加国内军阀混战的阎锡山学习。有署名“仲年”者撰文说：“今日之英雄，非段非孙，非袁非吴，非张非冯，而为不有战功之杨增新与阎锡山。”因杨、阎能安境自保，“行所无事”，使人民安居乐业。“此亦不世之才，而当今之杰也。吾川执政者，其又有意乎？”③“若说为保持饭碗之计，阎某之在山西，未尝不可奉以为法。”④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阎锡山在山西能安境自保，部分原因是他的独大，无人与他抗衡，四川军人却是派系林立，又彼此牵制，没有人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想学阎锡山而不可能。如前所述，这也正是多数人不把统一四川的希望放在单独某一派身上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一思路却颇揭示出提议者具有的那种内缩的眼光和心态。

另有一部分人则觉得把希望寄托在几个军人身上无异于虎谋皮，因此希望从更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强调四川政局不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般平民，自己不明白对于地方应负何种责任”⑤。一切委于军人，亦受制于军人。对此，他们提出川民自治的主张，其中又包括了自觉、自卫等方面：“欲解决川局频年之纠纷，与夫川民之倒悬者，究有何法？曰，首在川民之自觉。”⑥“求人不如求己”这句话，很可作我们的箴言，我们应当拳拳服膺，紧紧遵守，认定自卫是自立自治的基础，认定自卫是解决人生一切困难的工具。”但是，川民自治的基础并不好：“吾川因风气闭塞，交通不便，人民间有养成独立之习惯，而缺乏团结的精神。县区乡镇畛域之分甚严，各自为谋，各不相顾，任人分别蹂躏，尚不自觉”⑦。

川人不团结是当时不少旅外人士的共同看法：不但存在着行业畛域，工商学界“皆冰炭不相融，每致冲突”，“且有各县区分，各自为谋”⑧。30年代中期，北平师大四川同学会会刊的主编王漠也说，“四川人间的乡谊固然很厚，但是团结力则甚薄”。据他分析，这与自然环境有关：首先是“川人多单家散居”，其次，川人多移民后代，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因此，人民感情不睦，互相猜忌。他并指出，“此点在川人的向外发展与本省的政治上有极大的关系”⑨。

不过，这一点对在川人士来说，比起旅外川人，体会就不那么深切了。盖川人在外省多被人歧视（见后文），较之在川之时，尤知团结的必要。如1924年，重庆华隆、大盛两商家因受战事影响周转不灵而倒闭，供货商上海华洋杂货帮亦因期付交易受到

① 陆杰夫：《解决川局当召集‘川民会议’》，《蜀评月刊》第8期（1925年7月），“自由言论”栏第3页。

② 袁衡生：《川省裁兵办法刍议》，《蜀评月刊》第2期，“言论”栏第1页。

③ 仲年：《四川之英雄》，《蜀评月刊》第4期，“自由言论”栏第11页。

④ 邓朝荣：《川人快起来作民权运动》，《蜀评月刊》第6期，“自由言论”栏第16页。

⑤ 杰乎：《吾人对于此次川战应有之觉悟》，《蜀评月刊》第7期，“言论自由”栏第3页。

⑥ 泽昭：《促进民众之团结》，《蜀评月刊》第9期，“自由言论”栏第43页。

⑦ 刘矩：《吾川急宜联团自卫》，《蜀评月刊》第4期，“自由言论”栏第9—10页。

⑧ 胡笔生：《新年底贡献》，《蜀评月刊》第3期，“自由言论”栏第31页。

⑨ 王漠：《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1936年7月3日），第4—5页。

波及。华洋杂货帮组织的职员同益会指责华隆、大盛倒闭是因为资本不丰，“遂推及全川川商，均为一例”，要求川商付现交易；1925年春，又登出广告，“指告川渝各帮”。在这种情况下，旅沪川商也组织了旅沪川商协进会，以处理相关事宜，维护内部团结。当时就有人要求大家“合力经营”，并“深望此会能永久存在”，盖“一人苟安，人人苟安，沪上将无川商立足地，而宰割之来，必有甚于华洋杂货会者！”^①

事实上，当时便有人在《蜀评月刊》上指出，四川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外来的“宰割”：“吾川自民国成立以来，皆授制于人，而又不能治，反为祸乱极甚之区”。他由此得出结论：“人既不可治，当求诸己矣。”^②该刊另一篇署名“仲年”所著的文章，对此更多发挥：“环吾川者，为西藏，为青海，为滇黔湘鄂陕甘，皆吾中华民国之领土，而吾四川兄弟之省区也。”“然而回忆北军入川，陕军入川，鄂军入川，滇军入川，黔军入川，以及某某入川；则是吾川之外侮，并非打躬作揖之英法，而为吾兄弟之省，而为吾左右之邻，而为吾四万万中之同胞，天下痛心之事，孰有过于斯者！”^③这段文字多用排比，一咏三叹，作者情绪之激动，可想而知。其时万县惨案还未发生，四川人对来自外国的“外侮”体会不深，更多的倒是来自“兄弟之省”的宰割。事实上，这也正是四川自治运动（尤其是20年代初的自治运动）发生的契机之一^④。作者由这一经验推导出的结论显然带有浓厚的地域情绪。不过，既是“兄弟”，便仍是一家。团结自治，也并非就要分裂。对此，作者专门提出，川人自治是取与外省“一致”：“方今滇黔湘粤，联治声高，环境如斯，尤宜一致，否则外侮之来，又岂幸免？”^⑤盖兄弟之省自相残杀本来就是整个中国陷入分裂状态的一个表现。川人“团结自治以御外侮”，倒毋宁是先要立定脚跟，以免“亡省”，然后才谈得上救国。

四川人的“外侮”，若从全国的角度看，就是内乱。罗志田先生指出，近代“联省自治”思潮，遥启于清末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的无能为力^⑥。而20年代四川的自治运动，也和中央权力的衰弱有着密切的关联。不过，在这一时期，对四川这样内地省份的某些人来说，中央的不可依靠主要还不表现在不能有效抵御“外国”侵略的方面，而是它不能起到平息内争的作用^⑦。这与孙中山等人在同一时期主张联省自治的理由（“集权专制”不能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大不相同。盖此处的纠纷不是中央与地方的纠纷，而是各省之间的纠纷，其原因恰在于中央地位降低，无法集权。

实际上，20年代中期，外省人的势力已经基本上被驱除出川，剩下的一部分黔军也在1926年被刘湘驱逐。四川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当时即有人指出，“外省军人，既无桑梓之情，复无同乡之念，视所驻防地如征服区，肆意搜剥，勒捐抽税，无所不用其极……若本省人则不然。田园家产之所在，亲族戚友父子兄弟之所居，息息相关。而乃违背民意，扰乱乡邦，岂特国家之蠹贼，且为桑梓之公敌。世间至愚至笨者，孰有甚于此乎。然而今之拥兵黩武者，多以扰乱乡里为事，真不知其是何居心矣”^⑧。这位作者显然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把川乱的原因归为内在的，与“外侮”观恰好相反，但他所流露出的桑梓意识，比起“外侮”论者“仲年”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盖在仲年看来，外省人既为同胞，实不该侵略四川，故以为这是“天下最痛心之事”；而这位作者则以为，外省人既不与川人有同乡之情，剥削四川也并不奇怪。这实在已经在地域意识上走得很远了。

因此，我们看到，打破防区和破除畛域之见，就四川人内部而言，显然具有统一的意味。但从全国意识角度看，“川人团结”又往往是“四川人”这一地域观念的体现。同时，地方观念又常常与全国意识相表里。旅外川人对川政多所建言，不仅是因为单纯的桑梓之情，也和他们在外省的地位有关。盖四川在全国舆论中形象不佳，固然由于外省人不了解，但也是因为四川本来就乱。因此，旅外川人要想改变外省人对四川的恶劣印象，就一定要改变四川的混乱状态。

① 伍玉璋：《阅华洋杂货员同益会传单的感言》、《团结——并质旅沪川商协进会的发起者》，《蜀评月刊》第5期，“自由言论”栏第12—15页。

② 朱朝谦：《治川之我见》，《蜀评月刊》第5期，“自由言论”栏第31页。

③ 仲年：《团结自治以御外侮》，《蜀评月刊》第3期，“自由言论”栏第6—8页。

④ 前揭李达嘉书，第66—71页。

⑤ 仲年：《团结自治以御外侮》，《蜀评月刊》第3期，“自由言论”栏第6—8页。

⑥ 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第155页。下引孙中山语出自《就任大总统职宣言》，亦转引自罗文该页。

⑦ 关于四川的“联省自治”，参见前揭李达嘉书，第217页。

⑧ 杰乎：《兵匪压逼下之邻水县民》，《蜀评月刊》第4期，“自由言论”栏第7页。

另一方面，中国在内部分裂的忧患外，又有外来的威胁。这反过来又要影响到国内的局势和主张。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成立，“以励行互助，主张公道，增进桑梓幸福，及唤起同胞一致对外为宗旨”。这里边既有桑梓之情，又有全国观念。在该会发表的“对四川同胞宣言”中，更指出，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外患，但“民国成立以来，内乱到今未息，反把这样民族间不安的状态冷静下去。”“现在英国人就乘我们的内乱，将我们全国人民当亡国奴看待。”呼吁停止内战，“趁此时机，将民意团结一气来指挥军人去对外。”这是以攘外来安内的思路。为此，他们提醒四川同胞要有民族的观念：“莫有中国民族，中国能存在吗？莫有中国，四川能存在吗？”^①不过，就整体上看，这一呼吁在当时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以发表这一宣言的《蜀评月刊》而论，作为四川旅沪学、商界的同人刊物，在五卅运动期间，其言论方向仍以强调四川自治为主，对五卅事件的关注显然不足。

这一状况到1927年以后开始有了很大变化，尤其到30年代，随着外患威逼日甚，旅外川人的言论也越来越多地突出了民族观念和全国意识。

四川并非化外

北伐开始，川军纷纷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但川内的基本政治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因忙于应付各地军事实力派时起时伏的反对浪潮，也无暇西顾。因此，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虽已取得名义上的统一，四川的“独立”状态较之北洋时期却是有增无减^②。但“全国统一”给国内问题的根本解决带来了希望，使人们觉得事实上的割据状态更加难以忍受。因此，相对于南京政府的无所为，一些四川人，特别是旅外川人，对打破四川独立状态的呼吁要激烈得多。北伐期间，就有一批川籍国民党人和与国民党人联系密切的青年知识分子呼吁把四川作为征讨目标。1928年9月，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召开资州会议，讨论组织新的四川省政府。当时即有人指出，四川军人的“革命”，实是为了逃避真正革命的到来：“客军入川的声浪，不断的传到省内，于是他们计从心上，马上召集资州会议，商量组织省政府等问题，拿这省政府的大帽子对外可以抵御客军，对内又可使剥削民众的诸种手段，有所保障。”^③

但是，南京政府并没有进兵四川，反而在公布的四川省政府组织名单中，基本承认了资州会议的权力分配方案。这一方案出台以后，立即引起舆论界的批评。有人指出这是北洋政府治川政策的延续：“这种办法，在深居高拱于南京的党国要人，也许认为煞费苦心，再冠冕没有了，但是从咱们四川人(百姓)看来，就好的方面解释，可说是‘药不对症’；若从坏的方面解释，不啻‘为虎作伥’。”^④“从前北京政府治川策略，‘以川乱川’。现在南京政府的治川策略，是否挑拨川乱？不能断定，但这种不察事实的派[做]法，其结果又能去北京政府多远呢？”^⑤

作为国家统一的努力，这一时期的川籍国民党人图使四川“国家化”、“革命化”。1928年9月，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创办的《新四川》杂志出版，并在《发刊词》中宣布此刊物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把四川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区域，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所属的一个行省”^⑥。此处“真正”二字，值得注意。盖四川军人易帜，这时也一变成了国民党，真正的国民党倒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统一”仍然只是表面的，这不免使真国民党的青年感到失望。因此，“把四川改造成一个真正革命的区域”，也就是使其“成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所属的一个行省”。在这里，“革命化”与“国家化”是一致的。

新四川省政府的方案公布后，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当即致电中央，表示反对，谓这一方案表明“中枢犹未明了吾川情况，

① 《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对四川同胞宣言》，《蜀评月刊》第8期，“来件”栏第1—3页。

② Robert A. Kapp认为，1927—1937年这10年中，四川省的独立状态和军事力量达到了最高峰。见前揭Kapp书，第34、62页。不过，1935年后，四川的“独立”状态至少在政治方面被打破了。

③ 一夫：《组织四川省政府问题的商榷》，《蜀道周刊》（上海蜀道周刊社）第2期（1928年5月），第4页。

④ 刘明：《中央整理川事的阴阳和结果》，《蜀道周刊》第3期（1928年11月17日），第5—7页。

⑤ 南浦：《四川裁兵的矛盾现象》，《蜀道周刊》第2期，第11页。

⑥ 《发刊词》，《新四川》创刊号（1928年9月1日），第1页。

若不幸而更出于满足军人之希望，以求敷衍政令，而轻忽民众及四川同志之要求，此乃军阀政府之惯例，我国民政府，岂宜有此。”并警告说：如果中央政府“必欲迁就武人而轻民众，川民虽爱戴中央，而苏望绝，则死不择荫，亦当自求生路”^{⑪⑤}。同时，旅沪党员陈天民等19人又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从全国安定的角度，认为“军阀”“破坏法纪”，“风气自为”，理应查处，否则，“若将来他省效尤，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① 1928年10月17日，旅京同志会发表请愿宣言，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用武力解决四川问题，“长痛不如短痛，作一个一劳永逸能得长治久安的善法”，以“完成国民革命”②。

值得注意的是，旅沪同志会艳电指出，四川情形特殊，不能“照中枢处置他省惯例”，“组织省政府进行建设”。否则“假以名义，任其主持”，对国对民，都无益处。“兼值川省党务中断，尚未着手组织，民众散漫，决无能力监督省府，党的组织既未健全，一切建设，均无基础”，“真正人民的省政府实无产生之可能也。”因此要求“暂缓”设立四川省政府、西康绥靖委员会等。组织省政府既是“他省惯例”，正可为统一的象征。若只从“特殊”的角度着眼，必然不够“国家化”。但在当时四川政治的具体情势下，过于注意统一的象征，反会种下分裂的种子。而国民政府所处的具体情势，又使得它不能不强调“象征”的意义。

事实上，20年代以来，四川能保持半独立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远处西陲”的四川军人虽常常援引外力，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参与“逐鹿中原”的活动。因此，对“中央”的威胁相对来说也就比其他军事实力集团小得多。自然，自顾不暇的中央政府也就因此把四川放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国民政府初期，面临各地军事实力派的压力并不比北伐前的中央政府更少，其治川政策也就沿袭了北洋政府的态度：承认现状。四川人士的不满虽然迫切，四川情形毕竟无碍“大局”，故可暂时不顾。

1928年，有人在《蜀道》上发表文章，称：“‘四川僻居一隅，目前的治乱，对于大局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干系。大局一日未定，谁有余力顾及无大干系的局部问题？’这也是同志们口头常说的话。”③ 可知这一认识在当时国内颇有市场。对此，作者指出，四川问题不仅仅是四川人的问题，“四川是中国一大行省，四川问题，应随整个的中国问题一同解决。”认为四川无关中国大局的说法，也令有的四川人感到了侮辱。《新四川》上的一篇文章便提到：“四川是二十二行省中之物产最丰地域极大的，她既是整个中国的一个行省，而不是化外之民”，中央决不应该“忽略了四川的一局部”④。但显然，作为非主流派国民党人，他们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说服中央采纳他们的意见。

根据当时人的认知，解决四川问题，大抵有两条路。一条是“中央由上而下”解决之道，另一条则是由下而起的“川民自决”之道⑤。当然，还有由军人解决的中层道路。可是四川军人早已丧失民心，这条道路本就不通。从国民政府的处境和态度看，由中央自上而下解决的道路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因此，20年代中期“川民自治”思路也就得以延续下来。

前述川籍国民党人在这方面所做努力不容忽视。他们指出，四川民众“事事都只晓得一个自己，不晓得有社会有国家。”因此，要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引起他们的国家观念，提高他们国民的资格和做人的意识”⑥。与20年代中期呼吁“川民团结”的观念比起来，这一看法显然更具全国眼光。而通过国民党这一“组织”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个人”的力量进行民智开启的工作，也更合乎那一时期人们的集体主义共识。事实上，由于国民革命的迅速成功，三民主义的信仰，已经突破了“国民党”这个具体的组织范围，一时在社会上(主要是边缘知识分子群中)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号召力。“国家观念”更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用今日的话说，这一建议相当符合当时“政治正确”的标准。

① 《党治◆下的四川省政府组织问题——中国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致中央艳电》，《新四川》创刊号，第29—30页。下段引文亦出此处。

② 《资州会之反响——旅外川籍党员陈天民等对资州会议之快邮代电》，《新四川》第2期(1928年10月1日)，第34页。

③ 《中国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为救川请愿宣言》，《新四川》第2期，第21页。

④ 崇实：《一个错误的观念》，《蜀道周刊》第3期，第28—29页。

⑤ 醉春：《怎样才能促成党治的四川》，《新四川》创刊号，第16页。

⑥ 弱水：《四川裁兵的研究》，《蜀道周刊》第2期，第26页。

⑦ 微微：《四川青年目前的几个重大使命》，《新四川》第2期，第7—8页。

但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四川的力量十分薄弱，根本无力承担这一职责。1928年，有人回顾国民党在四川的创办历程说：“本党在四川的基础，最初是建筑在少数先进同志的身上，莫有具体的组织，即或有，不过是挂着国民党的招牌（有时还要取掉）。总理北上以后，宣传的力量，渐及西陲”，但不久，随着国、共两党的分裂，“四川党部，亦并为二，斯时斗争，异常激烈……斗争的结果，还是被投机的军阀一齐捣毁两省党部，本党在四川的基础，几乎动摇。”¹²^①事实上，党的基础建立在少数人的身上，与更重视“具体的组织”，正是国民党改组前后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正因为此，国民党组织在四川呈现“小组林立，勾心斗角”之相，且为军阀利用，“更足以使民众消失其对本党的信仰”^②。

显然，北伐以后旅外川人（包括旅外国民党人）要改变四川行政权力的运作结构，使其“国家化”的努力并不成功。这一努力，也未引起国内多数人的重视。

这一情形到了中央军入川之后都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大学学生邓克笃在1935年初说：“省外报纸常常用‘谜’字去解释四川，用‘耗子’（即鼠的俗名）去称呼四川人。”^③“谜”者，“不明究竟”也，与“罩在雾里”同义。这是民国以后四川政局给人的印象。“川耗子”则是长期以来外省人对四川人的歧视性称呼，四川的长期内战则更坐实了这一流传已久的负面品评（“窝里斗”）。1936年，王漠也忿忿不平地说：“近年来外面的人，对于川人大有排斥的心理与行为，川人的前途，感觉危险。即如此次中央的势力入川，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们，从他们的言词中，仿佛把四川当作化外。中央管理四川，是为国家增加了一部实力，而此等不肖之辈，仿佛是为他们加了一块征服地、殖民地的样子。”^④

王漠说“外面的人”对川人的排斥是“近年来”的事情，其实不然。前引清末山河子弟的文章中，就在褒奖了四川的地大物博之后，笔锋一转，提到四川人“为各省同胞所不耻，不骂我们是川老鼠，就骂四川人有奴隶性质，为中国民族中之最劣种。”可见这一歧视并非“近年”才有。不过，“近年”这一时间段，也不是一时兴到之言。如果我们把武汉大学川籍学生曹光洁在1933年的观察做一参照，其意义便凸现出来：“四川的混乱情形，早已为人们所深悉的，过去虽因交通的不便，及其内部的混乱，尚不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的生存的关系，而未为外面的人所深刻的注意；但是它近年来战争的频繁，以及武人的极事搜括，人民的呼吁；尤其是共产党借四川战乱的时机，而建立其根据地后，使它的情势陡然严重与紧张起来，要之外面的人对它亦不得不变更过去的态度了。”^⑤换言之，王漠所观察到的“排斥”，或有可能是外面的人开始“深刻的注意”到四川的表现。

正如曹光洁所说，外省人对四川态度的改变，与四川局势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存”（意即傅葆琛说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有关。这一转变基本上从1932年夏爆发“二刘之战”开始。这次战争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未已，颇为国人注目。报纸上充满了批评之声。其间，四川旅京同乡会分别致电刘湘和刘文辉，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内战。综观电文，充满了“我公”与“京沪一般拟议评论”的对比，又都以民族大义相招。如致刘湘电谓：“（我公）又谓‘于外交毫无影响’，然而在‘京沪一般拟议评论’，则以为我公若能立时停止军事行动更能勉强邻之讥评，回国际之观听。”致刘文辉电谓“我公力主和平，‘步步退让’，足征我公此时尚能顾虑国家体面，关怀人民痛苦”云云^⑥。可知“国家体面”乃是当时舆论关注的重点。

大战期间，《川事评论》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作《鼠典拾遗》，罗列了与“鼠”有关的一些词汇，暗寓“川耗子”的含义，语多讥讽，类似《魔鬼词典》一类的著作。其中有“五鼠闹东京”一条，便批评四川军人缺乏民族意识，不去抗日，反而在窝里斗中消耗国家的力量：“善哉善哉，若是他们真的是有去闹东京的志愿，现在不妨储蓄一点闹东京的力量，又何至于同室

① 庸夫：《从整个党的现状说到四川党务》，《新四川》创刊号，第11—12页。

② 庸夫：《四川党务的危机与其救济的方法》，《新四川》第2期，第11—13页。

③ 邓克笃：《论今日之四川及四川人》，《中国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创刊号（1935年1月30日），第37页。

④ 王漠：《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第6页。

⑤ 曹光洁：《川局及其今后》，《国立武汉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创刊号（1933年），第27—28页。

⑥ 《川战中之重要文电》，《川事评论》创刊号（1932年11月27日），第24页。

操戈，互相残杀呢？”¹³ ①

其实，早在2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人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批评过四川内战。如《蜀评月刊》1925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说道：“军人唯一目的，曰捍卫外侮，保卫治安……顾吾川则不然，无军亦乱，军多亦乱，殊与国家养兵之目的，背道而驰。……（军阀）虽身在舞台，究不知外侮为何物，治安何所指。”② 此文与《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对四川同胞宣言》一样，都发表在五卅事件后，背后显然有着民族危亡的影子。不过，这些言论在当时同样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而在30年代却频频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任鸿隽。作为四川人、主流派的知识分子，任鸿隽对消除地方观念、树立全国意识抱有明确的认识。他在1935年8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即提出“现代化”和“国立化”两大宗旨，特意提出：“应知四川大学，是国立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其间，他实行了一系列“国立化”的措施，包括聘请省外（包括旅外川籍）教授、把招生范围扩大到京、沪、平、津、粤等地③。

随着外患催逼，旅外川人也在做出更多的努力，一方面唤起川人的“国家观念”，一方面也要消除四川在外省人心中的恶劣形象，打通夔门内外的隔阂。在这一过程中，此前为少数“先知”提出的某些看法，得到了更多的赞同。

早在1925年，就已有人指出，从全国的视野看，四川地势险要，并非如人们一般认为的，只是僻处一隅，无关大局，而是举足轻重的：“川省据长江之上游，称天府之宏区，地大物博，应潮流而举足；一治一乱，扼时局之先机。”④ 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反响，但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则不断被人重复：“四川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的确可以算是西南重镇……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逐鹿的人们，绝不能放弃四川，谁对于四川，没有把握，谁便不免于西顾之忧，而且牵动其整个的计画。可怜的四川，便因此重要，而演出十七年来无限的悲剧。”⑤ “吾川从地理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吾全民族存立上观之，均为我国最重要之省份。”“故善治者，首先治蜀，蜀若治则全局可定，蜀若不治，全局亦难安定。”⑥

“川省虽僻远边陲，实居长江上游。”⑦ 四川的自然地理位置并无变化，但观察者的角度和态度变了，其在全国的地位也就自然改变。大家从前看到的，都是“僻远边陲”的一面，因此也就认为它无关大局。现在则要证明它不但与大局有关，而且还很重要，故它“居长江上游”、“扼时局之先机”的潜能就凸显出来。上段引文中“可怜的四川，便因此重要，而演出十七年来无限的悲剧”一句，便是态度变了的表现。这话与20年代人提出“川人治川”的依据颇有近似处，而意图和结论都不相同。那时的逻辑是，四川战祸多自外来，不能自主，因此要自治。这里看来还是在强调四川“可怜”，但其实是在向国民政府建议，不要放弃了四川，否则“便不免于后顾之忧”。

同时，1933年以后，国民政府也逐渐体会到四川对国家建设具有的重要性，确立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地位，这一认知也就越来越成为国人的共识。1936年，国民党人周开庆总结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四川的地位，在整个中国的观点上，就更加重要了起来。”“四川天赋之厚，本是本已形成国家的生命线”，现在“在地势上又成了我国家民族最后的防线。”“这种认识，三四年，已为全国人士所公认”。他并呼吁四川人对四川的重要性多加体会，树立起对全国的责任感：“四川人对于开发四川建设四川负着特殊的任务，即是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复兴，负着特殊的任务……我们这种见解，只是说明在今日的四川，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必定要有这一种认识。必定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还必须抱着‘有

① 半觉：《鼠典拾遗》，《川事评论》创刊号，第22页。

② 幸之：《治蜀刍议》，《蜀评月刊》第8期，“言论自由”栏第36页。

③ 引文和有关材料均见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80—190页。其他还包括禁止成立同乡会、举办国语演讲比赛等活动。有关问题将在我的博士论文“政治、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大学国立化——以四川大学为中心”中详加阐述。

④ 陈新民：《吾民之自决问题》，《蜀评月刊》第3期，“言论”栏第20页。

⑤ 弱水：《四川裁兵的研究》，《蜀道周刊》第2期，第22页。

⑥ 王漠：《发刊词》，《蜀铎》第1卷第1期（1935年12月15日），第1页。

⑦ 觉剑：《川战感言》，《川事评论》第2期，第19页。

了四川，有了四川人，中国终究要强盛起来’的决心。”¹⁴^①

从前人们对四川和四川人的诸多批评，无不自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入手做文章，并将地理上的边缘等同于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边缘。因此，要纠正国人对四川的歧视性认识，自当从地理位置始。四川被确定为民族复兴根据地，也的确与它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因此，这一点实是帮助四川人重树自信和全国眼光的关键所在。

入民国以来的四川，战乱频繁，持续既久，派系又多，在国内的军阀混战中，显得特别突出。这也是它被外省人看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中国大学的邓克笃辩护道，四川其实和外省一样：“四川是中国的一省，中国是世界的一国，牵一发而动全身，四川的情况和中国其他各省并无十分的大区别，最多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② 1934 年创刊的《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之《发刊词》也说：“特别要提出来的：四川是中国的缩影。”作者感到有把这句话“特别提出来”的必要，显然认为此是要紧之处。盖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四川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整个中国面临的问题。这不足以成为四川被人看不起的理由（因为按“缩影”说的逻辑，看不起四川，也就是看不起中国了），反而更加突出了解决四川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同一期张孟休的文章里也提到：“用一句最时髦的话来说：‘四川是中国社会最尖端的描写’。”^③ 从前面的引文看，这一认识即使不是当时“最时髦的”，至少也在旅平的川籍学生中颇得同调。

这一讲法也并不新鲜。20 年代以来，旅外川人对四川的批评之一就是四川为中国之最：“自鼎革于现今十有四载矣……被其（军阀政客）毒者，无省不然，而尤以吾川为最甚。”^④ “我们川省的兵祸匪祸，在全国中，可以算是第一了。”^⑤ 不过，这两类言论的基本意图显然不同。后一类的预设读者还是“我们”四川人，“爱之深而恨之切”，情绪不加掩饰，用语也不免苛刻，意在强调四川与外省在相同中包含着程度的差异。而“缩影”说的预设读者中虽然也包括了本省人，但主要还是对“外人”，故而强调的是四川与外省异中有同的一面。

《大公报》把四川称作“魔窟”，主要是针对军人而言。但外省人往往把四川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旅外川人感到有必要把四川人加以区分。他们强调，“使国人对我们发生了许多不良的观感和成见”的，其实只是“少数特殊阶级的行为”^⑥。“我们把四川人分成两类：一是军阀，一是平民。”^⑦ 二刘大战期间，国内舆论纷纷批评川人内讧，缺乏民族意识，四川旅平学生便在联名通电中，专门对此加以辩白：“川中军民屡请出师东下，以援十九路军收复失地。政府不发明令，并为刘湘所阻，国人不察，反谓此等非常之举，不能望诸川人，其实川人不全任其咎也。”^⑧

总之，这一时期旅外川人所做的基本努力就是如王宜昌所谓的，向人说明四川实是一处“不异的异乡”，促使四川人和外省人的互相了解，以使他们共同感知和建设一个完整的中国。用《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的创办者的话说，他们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使川人知道现时是怎样一个世界，自己所处的中国是怎样一个中国；使国人深切的明了四川，更明了四川对整个中国的关系；使川人了解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整个中国对四川的关系，四川在中国所占的地位，四川对中国应尽的责任。”^⑨

余 论

整体来看，20 年代中期以后旅外川人有关四川的言论，大抵以消除国内“异乡”形象为主，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四川已经存在的问题，一是打通夔门内外的隔阂（其中又包括对本省人发言和对外省人发言两个方面）。这主要由于他们所处的

① 周开庆：《四川人应有的自觉与自信》，《蜀铎》第 2 卷第 2 期，第 7 页。

② 邓克笃：《论今日之四川及四川人》，《中国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创刊号，第 37 页。

③ 张孟休：《红军扰川前的二刘之战》，《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1934 年，第 39 页。

④ 朱朝谦：《治川之我见》，《蜀评月刊》第 5 期，“自由言论”栏第 31 页。

⑤ 邓朝荣：《川人快起来作民权运动》，《蜀评月刊》第 6 期，第 14 页。

⑥ 《发刊词》，《蜀风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6 年 10 月 8 日），第 1 页。

⑦ 大公：《川民自决与消弭川战》，《川事评论》创刊号，第 12 页。

⑧ 张孟休：《红军扰川前的二刘之战》，《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第 50 页。

⑨ 《发刊词》，《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第 2 页。

特殊地位(处在四川人和外省人之间),使他们对此四川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问题尤多关注(在籍川人和外省人对改变四川形象的迫切感都不如旅外川人强)。

如前文所述,这些旅外川人中,青年学生占了绝大比例。他们本是要到外面去寻找“地道的中西文化”的,但出川以后,却直接面对外省人对四川和四川人的歧视。这部分是由于四川和文化中心地区存在的不同步发展造成的。王谟便观察到:“即已受过现代新式教育的青年,亦因社会的流传,尚存有十足的旧社会风味,在本省尚不大生妨碍,而出外面,其言语、举动、多有不如法之处,与外方相差甚远,是以我川子弟,一出外方,多受人歧视。”¹⁵①这种歧视不能不在旅外川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羞耻感。1933年11月5日,已经做了北大教授的张颐在北大四川同学会秋季大会上的发言,对四川同乡的勉励还是:“此后欲洗旧日耻辱,去掉川老鼠、烂榨菜之名,最好由砥砺学行、不尚空谈做起。”②

20年代中期,旅外川人关注的重点是川内事务。这不是说他们不关心国家,只是关于后者的言论相对要少一些。在国内没有一个压倒性的政治权威的情况下,“求人”当然不如“求己”。这一时期他们的言论多集中在四川的内部统一方面,基本上仍是通过地方自治以求全国统一的思路。1927年后,全国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外患催逼日切,国民政府获得了国内多数人的认可,情形也就不同。以全国统一来解决四川内部问题的思路成为可能,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旅外川人的支持。因此,这一时期他们的言论中心越来越集中在如何打通夔门内外隔阂的问题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出川学习最新的思潮,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又要面对外省人的歧视,这使得旅外川人的发言往往随特定的听众有所改变,带有中国传统的“内外有别”色彩。在对外省人说话时,多取为四川辩护态度;在对本省人讲话时,则用词苛刻。这种内外有别的心态是理解他们诸多行为和表现的关键。

陈衡哲1936年春在《独立评论》第194、195、196期上连续发表三篇《川行琐记》,对四川政治和社会多有批评,即在四川人中引发了不小的反感(南京的四川同乡会且有“纠正陈衡哲,警告任叔永”的提案),而成为任鸿隽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③(当然,任在川大的改革,得罪了一些川人,也反过来加重了四川人对陈衡哲的反感)。其实,陈衡哲对四川的批评,如吸鸦片、女学生做小妾等,确是事实,旅外川人自己也多有批评,且其措辞之严厉有时也不下于陈,但此前并未激起类似的波澜。事件发生后,不少四川人认定这是因为陈衡哲是外省人,故看到的都是四川不好的一面。其间所表现出来的旅外川人之心态变化,颇值得注意。

王谟对此事有一番评论,极有意思:“前几天有一位初到四川的女士,破口大骂四川人”,“于是乎激起了四川人的公愤,笔者也有点不平。兄弟现在也要说一点四川人的坏话,但是却不像某女士的意气用事,吹毛求疵,而是诚心改良川省的几个缺点,切望不要再像对某女士那样骂我。因为某女士是外省人,似乎像王姬下嫁似的,嫁到了不中她意的四川,这位洋气十足,文明过度的女士,对这不中她意的四川,当然是有一番娇骂。在婆家住久了……自然不会再骂”。而“兄弟是生于四川,长于四川的真正地道四川人,当然不会骂四川的”④。王显然赞同陈对四川的批评(但他并不赞同陈的措辞),但恰在风头上再来批评四川,也就不能不特意地剖白心迹,以免再遭骂。

王又强调,旅外川人在认知四川问题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非是原为四川人,惯熟四川的事情,而又在外面住得久的,比较了解外面情形的人,将外面与四川两相比较,不能发现四川人的特别的地方”⑤。这一番话显然带有自我辩解的意味,与前此旅外川人批评四川时的直言不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虽然有其特定的语境,但也提醒我们另一问题的存在,那就是,旅外川人和在川人士有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隔阂,而王谟显然感到了这一点。

① 王谟:《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第5页。

② 廖远兮:《会务报告》,《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创刊号,第126页。

③ 《四川大学史稿》,第208—209页。

④ 王谟:《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第3页。

⑤ 王谟:《四川人的特性与教育上应注意的几点》,《蜀铎》第2卷第2期,第3页。

事实上，不少旅外川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出川前就已接受了四川是“落伍”的这一观念，面对故乡，常常流露出改造者的心态。他们对四川加以批评时也就常常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居高临下的态度。换言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以为四川的“土著”是“落伍”的，需要他们去改造。但在面对外省人的时候，他们又常常感到有为四川辩护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体面。不过，其间仍有变化。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旅外川人主要是证明四川“不异”，但不久，“缩影”说越来越多地出现，四川岂止“不异”，实际上根本就已是全国的代表。30年代中期以后旅外川人越来越难以容忍外省人对四川的歧视，这一心态转变与四川作为“民族国家最后的防线”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凸显不无关联。

不管是国中的“异乡”还是“民族复兴的策源地”，四川在全国舆论中的形象变化，固然受四川这一地方因素的影响，也与整个国家乃至国际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这样，考察四川“国中异乡”现象的形成和演化进程以及旅外川人的相关社会心态转变，就从“地方史”或“地方性知识”的角度为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提供了更进一层的认识空间。

(责任编辑：马忠文)